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llage of historical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In the upper left, there is a portrait of Mao Zedong. To his right, a group of men in suits are standing together. Below Mao, there is a portrait of a man in a military-style uniform. In the lower right, a woman in a dark dress and hat is walking.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formal.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当代中国现实

主编

王文学 范汉森

石华翼 王德存

甘肃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现实

主编 王文学 范汉森
石华翼 王德存

甘肃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现实

主编 王文学 范汉森 石华翼 王德存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82,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52

ISBN 7-226-00778-9/B·48

定价：4.65元

目 录

序.....	(1)
--------	-------

第一编

第一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点	(17)
第二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	33)

第二编

第三题 毛泽东的两部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 《矛盾论》.....	(35)
第四题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 期的进一步展开.....	(85)
第五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深化 和发展.....	(124)

第三编

第六题 邓小平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 学思想.....	(155)
-----------------------------------	-------

第四编

第七题 江泽民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挥毛 泽东哲学思想.....	(203)
--------------------------------------	-------

第五编

第八题	周恩来在内政外交决策中的哲学思想	(268)
第九题	刘少奇建党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295)
第十题	朱德、刘伯承的军事哲学思想	(326)
第十一题	陈云、李先念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工、 作实践中的哲学思想	(348)
第十二题	董必武、彭真的法哲学思想	(376)
附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 想研究概述	(401)
后记		(415)

序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如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点是与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大家知道，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由于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左”右倾错误的内容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条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为了自觉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首先就必须从哲学上总结“左”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论证实现这一结合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既然是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也就必然把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毛泽东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重要著作。《实践论》总结和批判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教训。同时，也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取得了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经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怎样才能保证获得这种正确认识。《矛盾论》总结和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从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教训。同时，又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中敌我双方阵营由于种种情况而发生的发展变化，以及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情况，对于中国革命这些现实的复杂的矛盾进行深入研究的经验，提供了严谨而完

备的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总结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它们都是这条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在哲学上的概括和升华。《实践论》和《矛盾论》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成熟，它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在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长期发挥着指导作用。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这样的哲学专著中着力总结和论述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以外，毛泽东在许多论述军事、政治、文化问题的著作中，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也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任务，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解决。正是由于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正确地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因而才能正确地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从而推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而革命和建设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也总是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受到曲解和干扰，因而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相应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就在于：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和挫折、前进和曲折，始终是和能否正确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息息相关的。

关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着提高和贬低的两种偏向。很长一个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提高。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康生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林彪先是提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接着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最后的标准；

紧接着林彪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中又出现了怀疑和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偏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横加指责。有的人把《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论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以及苏联30年代出版的一些哲学教材进行简单的对照，从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独到之处。在这股否定和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潮流中，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偏向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的联系，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就在于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因而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紧紧地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环节，从这种结合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运用中来讲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这就反对和克服了上述的两种偏向。《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恰当的科学的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和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

坚持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早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实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研究了我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情，认识到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总结了武装割据的经验，明确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9年底，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自觉地把实际斗争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决议明确提出了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决议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实际上已经初步体现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的萌芽。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文中还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伟大真理。这篇文章实际上

又初步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雏形。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政治策略上和军事上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实际上成为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随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我们党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更加自觉、更加运用自如了。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首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研究和指导战争，论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敌我的情况，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有力地指导了抗战的进行。其次，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科学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他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都作了精辟的分析，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已经完全成熟，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认识水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一系列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坚强和壮大，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

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相背才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所具有的祖国的正义的革命的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敢不敢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在军事上采取了十大军事原则的战略战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正确地开展了整党、土改、保护和发展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这就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以夺取胜利的问题。由于既正确地解决了敢于斗争又正确地解决了善于斗争的问题，解放战争只进行了三年多就迅速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建国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适应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要求，及时提出了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我国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大国进行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社会却很少动荡，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连年增长，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党和毛泽东面临着认识新事物、解决

新问题的艰巨任务。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虽然也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但在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的指导上，却出现了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发展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这些错误表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偏差，离开了他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毛泽东晚年在思想路线上的失误，说明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只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认识根源来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正是违反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提出的、后来又在一系列著作中着重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违反了以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的基本思想来分析形势和认识国情，因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由于毛泽东把某些个别的、片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全面的东西，就在总体上、本质上违背了事物的本来面目，陷入了主观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一贯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晚年在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上的失误，不但不能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反而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任何人也违反不得的，违背了就必然要犯错误，即使毛泽东同志本人也不能例外。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坚持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未能解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肩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围绕着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优良传统的新的的发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概括。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因此，在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遵循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逐步加以解决。

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改革和建设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针对这些问题，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又确定了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措施。这就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确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的国庆讲话和五中全会的决定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由于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个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多年经济过热的结果，是长期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结果。

十三届五中全会之所以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困难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由于建国4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折腾和起落。每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时候，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急于求成的情绪，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损失。正是这种“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的恶性循环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清醒过来，认识到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40年来最重要的教训。五中全会总结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个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建设和改革都不能急于求成。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

完成之后，无论是工作比较顺利还是遇到难题的时候，都必须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五中全会决定总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可以说，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我们的经济工作、分析判断经济形势的基本标准。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我们党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建设工作方面，又取得了新的长足的进展。

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是能否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些同志长期认识不清的问题。江泽民在国庆讲话中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外政治生活的丰富实践，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多次泛滥特别是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这种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组成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本主义化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的方法，就是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四项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地得到坚持。另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的矛盾。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不是采用一方消灭一方的办法，而是二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坚持改革开放又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

就是这样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不断引向深入，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按照江泽民同志国庆讲话中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分析，五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五中全会的决定既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又明确指出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对改革开放以及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了。没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没有1989年的风波，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过去之所以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得不够一贯，不能说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无关。最近东欧局势的发展，也使我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都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才能对国内外的形势和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江泽民的国庆讲话和五中全会决定还深入地分析和论述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指出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的。进行治理整顿既表现为巩固和扩大改革的已有成果，也表现为纠正妨碍改革的偏差和失误。它们都是严格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来，在治理整顿期间，总的指导思想是，对十年改革中的政策措施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对的要坚持，不够的要补充，不完善的要加以完善。对那些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当然要纠正，但要十分谨慎。因此，决不能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